【论文】

明清以降中国南部边疆地区的国家整合方式研究上

杜树海2

摘要:从中国南部边疆研究的个案经验与国家整合的研究理路出发,可以总结明清以降边疆地区 国家整合的五种方式,即地缘血缘想象、文化地景塑造、礼法话语建构、资源/人员流动与信仰 仪式统合。具体而言,边地人群通过族谱书写、口传故事等形成了王朝国家内部地缘与血缘一统 性的想象;文化地景塑造不仅体现了当地人的审美态度与情感,还凝聚着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民众 的国家认同;礼法话语建构揭示出边地上层对于"大一统"礼法制度的学习与实践;资源/人员 流动说明了王朝国家后期日益频繁的物资、人员与信息流动对于国家整合的促进;信仰仪式统合 则显示了"大一统"文化元素在地方文化层级与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国家整合的一个结果是地方 文化具有了层次性。

关键词:南部边疆;国家整合;多层一统;地方传统。

一、国家整合的研究理路

笔者的博士论文曾以中越边境广西区域为研究地域,总结出当地的国家整合进程。北宋广西左、右江上游区域侬智高起事的失败,象征着在两个王朝国家的中间地带已经不存在建立与维持一个新王权的空间。宋末至明初,曾在中原王朝与安南王朝之间"两边倒"的地方势力有的被彻底消灭,有的则转而投入中原王朝的怀抱,并将祖先追溯至中原地区。明初在思明府(府治今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土司与安南王朝进行土地争夺的过程中,中央王朝的力量被引进、借重,土司势力范围逐渐成为国家边界。明王朝制定的礼法——有关土官承袭的规则与程序——成为土司与王朝"交流""沟通"的语言。一方面,王朝国家相当重视并努力控制土司权力传承的谱系;另一方面,土司内部势力则用伪造谱系的方法实现自身的利益。

明后期,土司统治内部流官权力凸显,思明府出现"一府两制""流土分治"的局面。到了清初,左、右江上游地区成为国家资源运输与人员流动的重要节点,鄂尔泰的军事镇压政策则奠定了广西土司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基础。

改土归流后,外来官员与科举功名体系推开后培养出的地方功名人士,联手改变了地方社会的文化面貌:归顺州(州治今广西百色市靖西市)的地方历史被建构为南宋义士所开创,"祖源广东南海"说成为普通大众遵循的模本。直到今日,我们仍能实地观察到不同文化传统与礼仪的叠合以及它们之间的层级与体系。如果说麽婆吟唱、土地公献祭等是比较古老的传统,那么扶乩等则是清代文教推开后产生的新传统。多样的传统在当地并不是杂乱无章地并存,它们形成的是一个融合的层级与体系,而那些与王朝国家"大一统"相关的传统占据着这个层级与体系的优势位置[1]。

那么,经由上述历史过程可以总结、提炼出什么样的概念、范畴,以供其他地域与学科的研究参考、借鉴呢?就此,本文尝试提出数种国家整合方式,以期建立一种量度明清以降边疆地区国家整合程度的指标体系。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国家整合"的概念,在本文中它指国家力量在各个地域建立、深化以及均质化,各个地域整合进国家范围以及一体化的过程。此一概念受到内特尔(Nettl)提出的"国家性"(stateness)的启发,内氏认为应该将国家视为一个概念性变量而非常量——不同国家间存在质和量的区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行有意义的实证的比较研究

¹ 本文刊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春季刊。

² 作者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2]。内特尔遵循的是比较政治学的路线,论证的是世界各地区、各国家之间存在的"国家性" 差别,而本文认为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地域亦存在此种差别,国家整合的过程就是"国家性"均质 化、一体化的过程。

论及国家整合,科大卫的"地方社会模式"理论虽然重点在于解释地方,但是已经明白透露出国家的建构、整合属性,他曾写道:"地方社会的模式,源于地方归纳在国家制度里面的过程。国家扩张所用、地方社会接纳的理论,就是地方社会模式的根据。循这一方面来走,我们了解一个地区的社会模式,需要问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归纳在国家的范围?第二,归纳到国家范畴的时候,双方是应用什么办法?"^[3]温春来揭示的黔西北从异域到旧疆的历史进程则为"国家整合"概念提供了精彩案例^[4]。就中越边境广西区域而言,部分学者的研究已经触及国家整合问题,蒋俊研究了历史上壮族土司主动融入中原文化的历史进程,罗彩娟对当下边境地区壮族的国家认同进行了人类学研究^[5]。前述研究或专注某一地域、某一具体方式,或无意定义、区分各种不同的国家整合方式,这正是本文的必要性之所在。

米歇尔·比利格(Michael Billig)曾经提出"日常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的概念,他认为传统上对民族主义的归纳多数只关注其暴力和血腥的一面,而往往忽视其日常化的、平和的一面,因此,他用"日常民族主义"一词来指称那些通常没有被注意到的、在每天生活中发生的、例行的实践。他形象地指出:"日常民族主义的换喻形象不是一面在狂热和激情下被有意识地挥舞的旗帜,而是一面在公共建筑物上悬挂的、没有被注意到的旗帜。"^[6]本文认为比利格对民族主义研究旧有传统的批判以及对新选路径的倡导,同样适用于有关国家以及国家整合的研究。

依据我们的传统研究,国家整合理应包括政制建置、军事部署、经济融合以及文教推广等方面,这方面较新近的研究是苏力关于"文化制度与国家构成"的研究^[7]。本文想要指出,这种研究更多地从王朝国家的视角出发,关注的重心是军事行动、典章制度、政策措施等的推行,基层百姓的感受与反应不过是论证典章制度等执行效果的证据;而此处的研究坚持从当地人群出发,关注的是人的实践活动和心理认同,王朝国家的典章制度等则为这些实践活动提供了创作框架和表演舞台。从重大历史事件转向民众的日常生活,是本文坚持的路线之一。刘志伟曾作出精辟概括:"我们如果尝试摆脱这一模式(指汉化模式——笔者注)的框框,提出另一视角,就不妨把帝国视为一个文化的观念,教化的过程,不是通过自上而下强令推行的,而是本地人自下而上利用国家秩序的语言,在地方社会中运用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如果国家建造的过程是包含着本地人如何用自己的办法去将自己同中心联系起来,我们与其将'边疆'视为一个承受国家制度扩张的开放空间,不如更多地关注地方上的人们如何运用他们的创意和能量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8]

因此,本文强调的是以下五种国家整合方式: 地缘血缘想象、文化地景塑造、礼法话语 建构、资源/人员流动以及信仰仪式统合。虽然上述国家整合方式总结、提炼于中越边境广西区域,但是它们对于中国南方边疆地区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例如,陈贤波就研究了清代贵州都柳江流域土司祖先故事的创作,黄菲研究了清代云南东川府的地景塑造与王朝国家及当地土著的关系^[9]。笔者更希望这样的经验总结突破地域模式的层面,希望这五种方式能够构成一种指标体系,用来量度明清时期整个王朝国家边疆地区的国家整合,也供其他地域研究结果的检验、修正与校准。总之,明清时期是中国国家疆域底定的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不同地域的国家整合意义重大。

二、五种国家整合方式

(一) 地缘血缘想象

"地缘血缘想象"作为一种国家整合方式,指明清时代边缘地区的人群通过墓碑族谱、口传故事等机制,建立起对王朝国家内部地缘、血缘统一性与连续性的认知与想象。

就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认同的想象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作出极具说服力的论述: "(民族)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10]回到历史上的明清时代,边缘地区的人群是如何形成他们对(王朝)国家的感知和认同的呢?本文认为,他们一方面需要知晓自己身在何处,另一方面需要明白这个国家还有哪些其他地域。最重要的是,还需要了解自身地域与其他地域之间的联系。从这个视角出发,历明至清广西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出现的祖源山东青州说、自广东南海迁徙的故事就显得意义重大。

在明代成化年间所制的石刻文字中,广西恩城赵氏土司(州治今广西崇左市大新县) 便把自身祖源追溯至跟随狄青南征侬智高的宋代将领,并视山东青州为祖籍地: "赵仁寿,本贯系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氏,跟随总兵官狄青来征邕州南蛮侬智高,获功绩,得地方水土,一并归附。祖赵仁寿特令恩城州世袭土官知州职事,子孙相继,承授祖业,传之后嗣,耿耿不泯。故此刻石以为之记。……时成化八年岁次壬辰三月三十日,致仕知州赵福惠立。" [11]

清代乾隆年间广西归顺州的功名人士覃恩祚在为其祖父树立的墓碑中,讲述了从广东南海迁徙的故事: "始祖印峰肇自广东南海,归马平乐,后移归顺州乐业。" 尽管在明代覃印峰本人的墓碑上并无丝毫相关的记载,但时至今日,靖西市的绝大多数姓氏均声称自身来自广东南海。

明代发端的山东青州说集中在土司或头目家族中,清代兴起的广东南海说则遍布普通民众之家。尽管这些说法明显缺乏史料支持,有的甚至已为学者所辨伪,严肃的学者多用其测度一个时代的社会情境,而不是将其当作真实的历史,但这些传说依然意义重大。它们不仅使得边缘人群明白自己从哪里来,是谁,还为边缘人群指示了前进的路向——他们应该和谁在一起。正因为这些故事恰好又都是祖源叙事,所以它们又为地缘上的想象打上血缘的烙印。附着于血缘的情感纽带最为朴素、纯真,人们对它的依恋度和忠诚度也最高。

这类祖源叙事在有的人看来是真实的历史,在部分学者看来不过是自卑者的攀附,但在笔者看来它们既是特殊地域国家整合的方式,也是国家整合的结果,体现了地域人群身份与认同的建立。当然这种身份与认同并不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生活的东西,它们永远和人们的生存境遇相配合,渗透着人们的生存智慧与生存策略。

明初,思明府土司为请求官员解缙为其父撰写神道碑而"流涕而跪"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思明黄氏土司一家虽早早归顺明王朝,但仍被明太祖斥为"蛮夷"。当时黄氏土司与安南王朝又有地界之争,他急于借助明王朝的力量向安南施压。于是乎,黄氏便主动从身份与认同上拉近与王朝国家的距离,叙述黄氏祖源在中原的神道碑也就应运而生。解缙的碑文叙述黄氏故国在湖广黄州,曾"尊周室,后并于楚",又说思明黄氏曾被狄青奏补成忠郎。这样的叙事显然能够帮助黄氏去掉"蛮夷"的身份:黄氏的根在中原,祖先曾被中原王朝授予官职。碑文中着重叙述了思明黄氏从宋至元的历史,这无疑有利于增强其统治这块土地的合法性。正如广成所言:"余家守此将三百年,而当两世革命之际,前有训武公,后有朝列公,实宪绥之。不有彰微,其何以示子孙,俾思明之人有所考见哉?"碑文所载元代镇南王出征安南,思明黄氏祖先予以协助的历史也被用来作为要求归还"侵地"的证据[12]。

在一个时段内,我们曾以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龙的传人等象征来维系一个民族(国家)的情感认同。如果对这种认同模式追根溯源的话,它的凭借与根基或许就在于历史上那些尚为复数、尚未归一的祖源叙事。

(二) 文化地景塑造

_

¹ 这是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所采录的碑文。

"文化地景塑造"是指明清时代的边地人群与地方官员合谋营造本地客观或虚拟的地 理景观,将国家意识形态与自身的国家认同、群体情感"物象化""定型化",并长久传承的过程。

"地景"(landscape),比较经典的定义是: "我们显然无法只把地景当成物质特性。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文本'予以解读,并且告诉居民和我们自己有关人群的故事——涉及他们的信仰与认同。这些并非永远不变,或是难以形容;有些部分是日常生活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有些则可能引起政治争端。" [13] 从客体对象上看,地景既包括自然景观,又包括人为活动形成的社会人文景观。不仅如此,地景还蕴含人类对景观的阐释,诸如神话、传说、故事等等;地景还附着人们的审美态度、情感认同以及意识形态。长江、黄河从水文数据上看,跟地球上其他河流相比,或许并无特异之处,但它们被赋予"中华民族母亲河"的称谓,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方志记载,明万历、崇祯年间朝廷官员与地方人士寻找象征中国南方边界的铜柱,此时出现钦州(州治今广西钦州市市区)地名"分茅岭":"分茅岭,州西南三百六十里古森洞 与交分界。山顶茅草南北异向。昔传马援平交趾于岭下,立铜柱以表汉界。崇祯九年张 国经访铜柱远近,得贴浪老叟黄朝会云,万历间会至其地,见茅草分垂两边,岭去铜柱尚远。"^[14]此地名或因中越边境地区某处山岭草木异形——山顶茅草南北分垂——而出现,但它被认定为明王朝与安南的分界标志,颇具中国历史上天人感应思想的意味。光绪十二年(1886 年)中法战争后,两国官员勘分清、越边界,分茅岭成为谈判桌上的重要分界依据。

乾隆年间广西镇安府(府治今广西百色市德保县)属龙神庙的兴建,不仅在原有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增添了人文景观,关键是还引进了"大一统"的神灵,并对地方原有神灵形成一种凌驾之势。建庙碑文记载,这位神灵的进入还与遥远的皇帝旨意有关:"我世宗宪皇帝念切民依,如伤在抱,虑四方旱涝之不济,爰于雍正八年敕封龙神分主各省,令天下俱立庙虔祀。其为四海苍生计,至周且渥矣。"^[15]即朝廷于雍正八年有敕封各省龙神分主,全天下俱立庙祭祀的旨意。由此可见,乾隆年间镇安府修建龙神庙不过是王朝政治运作的一个环节,亦可见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都在做着同样一种事,即利用祭祀、信仰等来实现王朝国家在文化方面的一统性。

同治年间归顺州的功名人士通过树立张天宗塑像,修建张天宗墓园,将本地宋代土著溪峒首领改头换面,打造成为曾随文天祥抗元的南宋义士。明代本地岑姓土司,亦即宋代张姓首领的征服者、后继者,有意无意地忽视前代真实的历史,他们更愿意将张姓首领放入神的范畴,借以削弱其世俗影响力;而清代的功名人士则重新把神还原为人,不过此人已非彼人,土著首领变为更加符合功名人士理想的南宋义士。同一段历史在此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命运、境遇,不同历史主体对它的重新阐释和改写,蕴含着各个历史场域的合法性与正统性竞争。清朝中后期,归顺州一地的意识形态就是消除土司的遗留影响,建立王朝国家的正统性[16]。总之,因张天宗墓园的修建、塑像的树立,本地的"蛮夷之气"一洗而尽,地方士气为之鼓舞。这种情感充分体现在民国时期靖西中学的校歌歌词里面:"边疆幅员千万里曾经谁开辟?昔年张天宗;云山鹅泉峰峦地期待谁整理?今日我靖中。"

其实,地景有时还可以完全脱离客观对象的限制,本文尝试谓之为"虚拟地景",即不存在客观对象物的地景。如前文已述的铜柱,传说其为东汉时马援将军征讨交趾二征起事时所立。6世纪成书的《水经注》引《临邑记》:"建武十九年,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也。"^[17]于是铜柱成为中国南方边界的最重要标志物。到了明初,安南方面就明言"千载之下,陵谷迁变,谁复能辨"^[18],但是有没有真实的铜柱已不重要,关键是人们坚信有一处马援所树、象征分界的铜柱存在。时至今日,当我们在广西东兴市口岸附近采访时,仍有当地老者声称其小时候曾在口岸对面的越南境内看见过铜柱。按其说法,铜柱如碗口粗。

明清时期诸多广西或外来的文人墨客均写有凭吊马援的诗歌,其中铜柱往往是不可或缺的象征物,现试举一例:"南天自古限江河,犹记当年马伏波。铜柱曾经标粤界,镡津永不混蛮歌。"

[19] 这首诗为清代广西中部一个县的地方文人所写,"镡津"即是他所在地的名称。在他看来,正是因为马援所立铜柱划清了广西与越南的边界,才使得他的家乡永远脱离"蛮歌"地带。寻找与制造一种边界,将"外部人"限制在外部,将"自己人"圈定在内部,这就是内部整合的重要手段。总之,边缘地区地景的塑造既渗透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又凝聚着地方人群的情感认同,是国家整合的重要方式。

(三) 礼法话语建构

"礼法话语建构"指在明代朝廷推行有关土司承袭制度的背景之下,边地上层人群在不断争论、挪用国家制度的同时,逐渐习得象征王朝国家"大一统"的家族制度以及儒家理念。

理解中国的国家整合,自然离不开对中国制度文明的研究。但是,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制度显然再也不能沿用"死"制度的老观点——仅仅关注制度条文、制度框架等等,以为这些制度曾经被切切实实、不走样地执行过;我们需要的是"活"的制度史研究:制度如何被制定?制度如何被执行和利用,以实现不同个人、群体的目的和利益?亦即制度如何成为一个对话过程。

明朝廷于洪武年间出台有关土司承袭的制度: "湖广、四川、云南、广西土官承袭,务要验封司委官体勘,别无争袭之人,明白取具宗支图本,并官吏人等结状,呈部具奏,照例承袭。" [20] 这项制度影响深远,一方面,它直接促进了土司的家族化以及土司家谱书写传统的形成; 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它促进了一种囊括各方的礼法话语的形成。回到历史情境之中,我们发现土司承袭制度并非铁板一块,它不但是对原有地方传统的承认与妥协,还充满争议空间。王朝、官员更多时候都是"选择性执法",借着这套制度打击那些叛乱无常的土酋,拉拢那些可供驱使的土酋。例如,嘉靖年间广西龙州土司(州治今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官族赵楷被朝廷认定具有戕害侄子、篡夺土司职位的罪行,但朝廷官员在处置他时,仍许诺由其子承袭土司之职,条件是他要保持地方的稳定。史载: "(翁) 万达召楷及邓瑀等入见,伏壮士劫之,曰: 汝辈滔夭罪,不得活,命尽今日矣,宜自为计。楷死,官必及汝子,可为书谕汝党,勿乱也。" [21]

面对王朝国家在土司职位袭替过程中的系谱控制,土司内部各种势力却也知晓如何利用这套制度,制造谱系、冒充朝命的事例举不胜举。嘉靖时,思明府土官黄朝就曾伙同头目,声称自己与情妇之子乃邻境凭祥土州(今广西凭祥市)土官之孙而争袭: "(苏寄枝、李满)阴比黄朝,朝有外妇子时芳,长矣,诡云广宁孙也,父琏争立时避居思明生。朝以千人纳时芳凭祥,弗克。" [22] 又如,在前述龙州土司职位的争夺战中,便有一帮头目支持一位 13 岁的小孩出任新的土司。他们的理由是,老土司天生异相,长有六个手指头,现在他们支持的小土司也是六个手指头,所以是"货真价实"的 [23]。总之,在这些林林总总传奇故事般的叙述中,各种说法的真实性实难确定,这反映了各种势力出于各自利益,对不同袭替人选正统性的宣称与争论,也反映出当时依靠家族系谱作土官职位袭替的实践遇到很多问题,假冒、替换等现象还很常见。文字的系谱始终停留在纸面之上,在那个时代对应袭之人"验明正身"确实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所以出现了以手指个数来证明身份的故事。

尽管明代的土司承袭制度漏洞繁多,执行起来更是多有偏颇,但是王朝官员、土司势力均非常重视并十分熟悉这套制度,因为这套制度就是他们共享的论证合法性的理据,他们在相互争论、博弈之时需要不断援引。这就构成了一种话语平台,各方均能利用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又将各方整合到一起。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整合作用,我们可将其放置于历史比较的视角之下。宋元时期,广西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地方土酋与中央王朝大致保持一种"进贡-授官"的互动关系,王朝国家对于地方权力的传承等等土酋内部的事务并不关心。进入明初,正是这套承袭制度的出现,为各方提供了一个参与平台,各方均能据此进行争论、博弈,地方土司也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实践"大一统"的家族理念。我们知道,进入清代,南方地区的绝大多数土司都被改土归流,即便那些留存至清末民初的土司,其统治、治理功能也被逐渐剥离,土司制度的转化方向和承接载体正是由汉

1 9 2 2

人地区移植而来的家族制度。亦即,土司被改土归流或其政治功能被剥离后,通常以"家族"形式长期存在。

总体而言,在明代大部分时间里,地方土司受到的王朝国家的军事、政治压力并不算大。广西边境地区的卫所军人大多被用来修筑流府城墙,或被用于刺探情报;土司地区的钱粮税赋也是"俾其认纳,永不加增"。王朝国家并不想,当然也缺乏足够的能力大规模建立直接统治。

最后,让我们用一种"牌局理论"来形象地说明前述的整合作用。坐在牌桌前的人往往类型复杂,有的老老实实按规则出牌,有的时时处处想着出千作弊,有的则不断挑战牌局规则,要求修改规则等等。但是,牌桌上的人终究相信有一套规则的存在,正是关于这套规则的争论、博弈与妥协将他们结成一个"局",而不是其他,那些远远坐着的旁观者与他们显然不构成一个"局"。总之,让一群互不熟悉的人学习一套规则,这套规则最好有些弹性与漏洞,以使他们相互争论、博弈,这就是一种把人们整合成一个团体的好办法。

(四)资源/人员流动

"资源/人员流动"指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乾隆以降,王朝国家内部物资、人员与信息的流动呈现大规模、高强度的趋势,这促进了各地域(特别是边缘地区)整合进王朝国家的进程。

对于边疆地区而言,地方物产成为国家资源即象征着地方的被整合。有关于此,斯科特曾作过一个有趣的比喻:"一个前现代东南亚大陆上的统治者对我们今天称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东西不怎么感兴趣,他们对或可称为国家可用生产(state-accessible product)的东西更感兴趣。……国家可用生产必须容易辨识、监控和计量,即容易评估。国家可用生产还必须在地理上足够近便。" [24] 这个比喻其实可以延伸理解:国家由于动员能力、技术水平等的提升,正不断把各地物产(可类比斯科特所说的 GDP)转化为国家资源(可类比斯科特所说的 SAP)。近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清代云南铜矿开发的专著,冠名为"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 [25],书中重点叙述了国家需求、国家管制与矿业开发之间的关系,国家的矿产需求包括币材需求、军备需求等等。其实当时此区域内矿业的开发甚至跟国际市场、国际竞争关系密切。清初铜矿的需求一直依赖从日本进口解决,康熙年间日本减少铜矿出口,这也迫使朝廷全力推进滇铜开采。地方物产被开发利用,成为国家资源,无疑标志着地域的国家整合取得巨大成功。

资源在被开采后必然进入运输环节,由运输线路构成的运输网络则将更大的地域联系起来。我们知道,清代乾隆以后,由云南至广西右江水道的线路成为滇铜外运的主要渠道,这条运输通道由右江至西江后,一路往北经灵渠入长江水系,一路往东经珠江水系入广东、江西。史载:"各省局赴云南买铜者,各厂铜自寻甸店、省店运至竹园村,由竹园村至剥隘。金钗厂铜,自蒙自县运至剥隘,再由剥隘经百色、宝广径达粤江,余局由陡河达湘江。"[26]

物资流动必然伴随人员的流动,乾隆以后人口从聚集地区向边缘地区流动成为一个全国现象。就广西中越边境地区而言,乾隆时期的地方志即记载广西人常常借口外出贸易,赴中越边境地带挖矿谋利:"广西道通交阯,闻该地方常有无知愚民,希图意外之利,抛弃家业,潜往交阯地方开矿。其所去之人有资本用尽乞食而回者,有侥幸获利而回者,有一去而永不回者。地方官虽禁谕稽查,伊等总以出外贸易为词。"^[27]其实,不只粤西之人前往开矿,其他各省民人亦蜂拥而至,"即云南、广东、福建、江西、湖广等省民人往交贸易及开挖矿厂者,亦不可胜数"^[28]。中越边境沿海地带的情况完全类似,民国《钦县志》载:"乾嘉以后,外籍迁钦,五倍土著。"

麦哲维(Steven B. Miles)研究了清代横跨广西、广东的西江水域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广东移民进入广西),包括官员、士子的流动,商业移民以及商业网络的建构等等。最有意思的是,他还考察了在珠江三角洲与广西边疆族群地区形成的离散家庭——来回移动的广东男子在两头娶妻生子,形成家庭。广东男子甚至把广西的土著妇女带回广东地区,西江上游的亲戚也参与下

游的宗族建设。在麦哲维看来,西江上游边缘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整合很大程度上是广东移 民在流域上下游间环流的结果[30]。

人员流动又带来信息的交流。乾隆年间,广西、云南、贵州及广东四省几乎同时发生 "挖 窖案"。官方档案载: "(乾隆八年)正月内有匪类黄三等五人,在州1属岜赖寨卢全家中安歇。 黄三等自称我会做巫公并访问古硐银厂, 我有符章粘在硐门, 就可收得, 若有银两分与你们大家 去用,有军器宝贝要拏去送新王,后来都有好处等语。生等见其妖言惑众, 干系地方,当即设 法于二月初七日将黄三等四名擒获。"^[31]黄三自称会做巫公²,能够访问 古硐³、银厂,会使符 章获取银两、宝贝,并有"军器送新王"等语,所以当地监生、头目以匪类的名义将其抓获。在 结案之时,时任广西巡抚的杨锡绂上疏总结"挖窖案"的大致情形: "一种挖窖取银之说,不知 始自何时,创自何人,居然有书有图,抄写流传。其點者明知子虚而故奉为神奇,其蠢者相随附 和而暗堕其术中。"[32]四省人受到相似邪术——通过书符可以挖窖取银——的蛊惑,足见当时 信息交流速度之快与范围之大。

总之,无论是物资流动、人员流动,还是信息流动,都是国家内部整合的重要方式。这相对 于那些曾被视为"异域""绝域"的边缘之区来说,则更显出特别意义。试想:一群与世隔绝的 人如何能够感知他们所在的王朝国家?又如何能够形成更高层次的身份与认同?

(五) 信仰仪式统合

"信仰仪式统合"指不同文化传统在不同历史时期层叠堆积形成了一地的地方文化,而在地 方文化的层级与体系里面,象征王朝国家"大一统"的文化元素起着统合作用,从而赢得民众的 认同与服膺。

在边缘地方研究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这里文化传统层次分明、清晰可见, 原因在于文化(政治)中心或者其附近地带,文化传统覆盖频率高且覆盖彻底,而在边缘地带文 化传统覆盖频率低且覆盖不彻底。在传统时期更是如此,正如俗语所谓的"天高皇帝远""十里 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在广西边疆地区,文化传统的分层特点十分明显,可举出诸多例证。例 如,当地有两种不同的个人命名(称呼)系统,一种是村落内部的壮语式土名,一种是标准化的 汉字姓名。 在靖西市有两种不同版本的张天宗故事, 一种版本里张天宗更像本地的土地神, 另一 版本里张天宗则是南宋义士。

当然,这种现象特别体现在民间信仰与仪式上面。在以往,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往往注 重对地区、民族的文化独特性深入挖掘,而对一些具有跨区域特征的文化事项却缺乏关注。以广 西左、右江地区的民间信仰与仪式研究为例,目前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麽公" 与"麽婆" 4[33]

麽婆,又有其他学者译作"魔婆",当地女性仪式专家。"麽"在当地话中有两种意思,一是蚂蚁, 是低声念诵。关于麽婆的研究有高雅宁《广西靖西县壮人农村社会中(魔婆)的养成过程与仪式表演》,台 北的唐山出版社 2002 年版。该书借助对魔婆养成过程的描述,呈现魔婆具有力量的基础,通过对仪式过程的

¹ 指贵州永丰州,今即与广西接壤的黔西南州贞丰县。

² 在今日之百色市民间仍有"巫公",又写作"麽公", "麽"当地读作"mo"。

³ 硐指藏有矿产的山洞。

⁴ 麽公,又称"布麽",为当地男性仪式专家。关于布麽详见黄桂秋《壮族麽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6 年 版。黄先生认为广西西部左、右江流域及红水河流域存在麽教。"麽教是壮族社会历史上特有的民族民间宗教", "麼教树立有统一的最高神祇:布洛陀和麼渌甲"。"麼教有自己的基本教义和教规","麼教传承有較系统 的经典: 司麽"。"麽教已形成较固定的法事仪式: 古麽"。"麽教有半职业的从教者: 布麽"。见该书第 12 页至第 20 页。黄先生田野经验丰富,搜集的资料十分充足,但该书中的论述很可能掉进了西方宗教概念的 陷阱,结果使得"麽教"被建构出来,影响到我们对社会实态的认识。不过,在以右往河谷为中心的区域发现 大量的布麽经书,这确实引人瞩目。《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的"前言"称,该丛书是整理者将在广西右 江流域、红水河中上游以及云南文山州壮族地区搜集到的39本麽教经书精选汇集而成。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 壮族麽经在流传的过程中亦吸取了道、佛、儒的一些观念,但从总体和本质上看,麽经可视为壮族原生态文化 的百科全书,是一项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见张声震主编《壮族麽经布洛陀影 印译注》第一卷,广西民族出 版社 2004 年版第 35 页。

上面,而更具王朝国家"大一统"特点的道教传统、扶乩传统则乏人关注。其实,在今日的南部边疆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有着不同时间深度、与不同中心相联系的文化传统(如道士、麽公、麽婆、扶乩等各自的传统)在同一时空展演。笔者在广西大新县、靖西市观察获知,当地的仪式专家主要有三种,即道士、麽公与麽婆。三者的区别,即使一般人也可轻易地看出来:道士使用汉字写成的经书,念诵时用桂柳官话;麽公的经书用土俗字^{1[34]}写成,用本地话壮语念诵;而麽婆则没有经书,用铜链敲击声来伴和吟唱。根据笔者的研究,麽婆仪式是华南地区较为古老的底层传统,麽公仪式是唐宋时期产生的壮族次生文化传统,道士仪式则属更为晚近(明清时期)的王朝国家"大传统"。

不过,那些与王朝国家"大一统"相联系的传统,总是占据地方文化权力关系中的优势 地位,这样也就建构了一种文化权力的层级与体系。在广西中越边境地区举行的太平清醮仪式,道士、麽公与麽婆共同参与,但是道士主导仪式的时间过程与空间安排,道士与麽公、麽婆之间还存在灵力的传递关系。

据此,可以总结、提炼出"多层一统"的概念:地方的信仰与仪式是在不同时间段内借由不同方式层叠形成的,这一层层的信仰仪式传统可能跟不同的地域中心相联系;在层叠之时各种传统的边界可能相互渗透,但仍清晰可辨。地方的信仰仪式文化并不是杂乱无章的拼盘,而是融合的层级与体系。那些代表"大一统"的传统往往在这个层级与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形成对其他文化传统的一种统合之势,并赢得民众的认同与服膺。"多层一统"既可以说明国家的整合,也可以解释地方的延续。

三、余论: 国家整合和地方传统

讲了这么多国家整合,这是否意味着各地的地方传统必然走上同质化、"标准化"的道路?通过前述研究,可知答案是否定的。今天我们在当地仍能观察到不同文化传统在同一时空中的共存、共生。不同文化传统差异仍大,无论是从形式上看,还是从内容上看,都没有被"标准化"。本文认为,文化传统是不断叠加的,新的覆盖旧的,但这并不等于斩草除根,推倒重来,旧的完全没有了生路,新加的一层可以运转良好,原来的也可以继续存活。

当然,有时候要揭示这些层叠的文化传统(如历史叙述)亦并非易事,因为后加的会对先在的作有意无意的涂抹、修改,另外这些文化传统也可能早已相互渗透、融合。鲁西奇曾提出"中国历史的南方脉络"概念,主张通过作者身份背景考证、史源分析等方法区分出 古史系统中的地域传统^[35]。斯科特则走得更远,主张从生计方式、社会结构等方面发掘 "不被统治者"的历史,在他看来文字书写本身就是遮蔽历史的手段^{[36][37]}。本文认为,借由人类学的信仰仪式与口头传统研究,可以较为清晰地观察到至今仍存的地方传统。

关于信仰仪式研究, Erik Mueggler 和马健雄分别对云南彝族、拉祜族信仰仪式与集体记忆的研究堪称成功的案例^[38];关于口头传统研究,笔者曾撰文分析有关侬智高的传说 故事^[39]。侬在王朝官员、士大夫眼中是蛮夷、叛臣,在部分历史学家眼中是农民起义领袖,在另外一些历史学家眼中又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那么当地人究竟如何记忆并看待侬,特别是侬起事的失

1 9 2 2

描述,显示仪式所处理的是社会延续的问题;经由对仪式唱词的分析,说明魔婆如何用宗教语言透过仪式行动解决社会延续的问题。萧梅在《唱在巫路上——广西靖西壮族"魔仪"音声的考察与研究》一文中,详细描述了魔婆(麽婆)举行的四种仪式,并以音乐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为支撑,在魔婆音声力量的来源、音声与附体的双向关系、魔婆成巫与传承及其社会角色的生命史等方面作了探索。

¹ 研究者称之为"方块壮字"或"古壮字"。这种文字大多借用汉字的偏旁重新组合而成,用来记录壮语的发音与语义。比如""字是水田之意,其发音为"那"。1989 年出版的《古壮字字典》共收录四千九百多个这样的文字。

败呢?其实当地人是用一种以"时机不巧"为母题的传说故事来述说侬的:侬并不是实力不济,他其实非常强大,只是因为无意触犯了法术禁忌,才最终功亏一篑。

历史上族群接触频繁,"叛乱"较多的南方边缘地区,至今广泛流行着此类"时机不巧"型 "叛乱"失败故事。这里我们可以读读朱晴晴在黔东南侗族聚居地黄封地区采集到的类似故事:

从前有一个反王,他的力气非常大,可以将很粗的竹子连根拔起。他一直都在修炼一种本领,一旦成功,就可以将一支巨箭一下子射到京城去,将皇帝射死。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刻苦修炼,他终于快要大功告成。于是他告诉自己的母亲,第二天鸡叫的时候一定要叫醒他,这样他就可以趁皇帝上早朝的时候,一箭把他射死。因此他的母亲就一直未睡,等待着鸡叫。但到天快要亮的时候,她实在是太困了,就拿起筛子开始筛米,这样一来鸡听到筛米的声音就以为天亮了,便开始叫了起来。她就叫醒儿子,告诉他天亮了。反王就拿起弓箭,射向紫禁城,但那时皇帝还没有上早朝,箭正好射到了龙椅上面。皇帝得知这件事之后,就四处派人查找元凶,结果查到了黄封,抓住了反王,将其杀死,其血染红了一条小河[40]。

从这种地方传统我们可以读出"失败者"的些许心态与声音来,尽管这种心态是那么微妙, 尽管这种声音经过层层覆盖。

最后还有一种情况,有的边缘少数族群拥有自己的文字传统,从用他们自己文字写成的史料里面我们也能读出不一样的历史传统来。下面一段史料节选自原文为傣文的《勐泐王族世系》^{1 [41]},从中可以体会在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段内,西双版纳傣人(傣泐)如何想象与周遭人群的关系,亦即他们的"世界观":

帕雅英 (天王) 命令密柱甘嘛底麻稳 (天神) 说: "你变成两只孔雀下凡,一只飞到密底哈纳管 (中国),告诉天朝汉王;一只飞到勐戈桑勐漫 (骠国),告诉骠王。天朝汉王住在北方,是民主选举的哈先 (巴利语,即国王),是父王。骠王住在南方,也是民主选举的国王,是傣泐的母亲。你必须在明天天亮前同时到达两地,站在宫廷上,同时呼喊两个国王的名字,要他们同时赶到勐巴腊纳西因 (景洪古称,下同),共同商讨大事;派出使者到勐南掌 (古老挝) 勐龙帕王 (即今琅勃拉邦),找回勐泐王的后裔,在勐巴腊纳西因建立佛寺。"并对孔雀说: "若天朝汉王与骠王三天后不按时到达勐巴腊纳西因,你就把他们的头炸成七块,天诛地灭。" [42]

总之,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应是我们众多研究的起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构想出一套富有动力学的解释机制,以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笔者以为提出"多层一统"的概念是这方面的初步尝试,在以后的研究中也将继续推进这个概念的论证。

参考文献

- [1]杜树海,边疆构建与社会变迁——宋明以降中越边境广西左、右江上游流域的历史与记忆 [D]. 广州:中山大学,2011.
- ^[2] 张长东,比较政治学视角下的国家理论发展 [C] //俞可平主编,北大政治学评论(第3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8:207.
- [3] 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 [C] //华南研究会编,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香港: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29.
- [4] 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 2008.

33

¹《勐泐王族世系》据说记载了西双版纳等地在第一代傣王帕雅真(12世纪)之前的历史,但是可以发现其充满神话色彩。原文是传抄本,作者与创作年代无法确认。"勐泐"即"泐国"之意,为西双版纳傣人在宋元时期的联盟国家。抄本虽名为"勐泐王族世系",其实是在追溯勐泐前史。

- [5] 蒋俊,帝国边陲——桂西土司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D].厦门:厦门大学,2008;罗彩娟,从"归顺"到"靖西":边疆地区壮族的国家认同研究 [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
- [6] 高奇琦, 宏观民族分析的微观基础: 西方日常民族主义理论评述及补充[J]. 民族研究, 2012, (2).
- [7] 苏力,文化制度与国家构成——以"书同文"和"官话"为视角 [J].中国社会科学,2013, (12).
- [8] 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 [J].历史研究,2003,(1).
- [9] 陈贤波,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明代以后贵州都柳江上游地区研究 [M].北京:三联书店, 2011; Fei Huang. *Reshaping the Frontier Landscape: Dongchuan in Eighteenth-century Southwest China*,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 2018.
- ^[10]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M].吴叡人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6.
- [11] 何农林编,足迹——广西大新县文物普查保护资料汇编 [Z].广西大新县文物管理所,广西大新县博物馆,2006.10.
- [12] 杜树海,宋末至明初广西左江上游土酋势力的动向——从《知思明府黄公神道碑》看祖先叙事的创制[J].民族研究,2013(4).
- [13] Mike Crang,文化地理学 [M],王志弘等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3.52.
- ^[14] 钦州志(道光) [M].卷一《山川》
- [15] [27] 镇安府志(乾隆) [M],卷八《艺文志》.
- [16] 杜树海,清代边疆地区社会阶层的变动与文化面貌的转变:以广西靖西县墓碑、石刻等历史资料为中心的考察[J],社会,2016,(1).
- [17] 郦道元著,陈桥驿注释,水经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565.
- [18] 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 [M],卷二百五十,上海:上海书店,1984.3624-3626.
- [19] 藤县志 (光绪) [M].卷二十《艺文志》.
- ^[20] 申时行等,大明会典 [M].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 789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13-114.
- [21] [22] 田汝成,行边纪闻 [C] //滇考、行边纪闻、雷波琐记合订本,台北:华文书局,1968:449.451.
- [23] 张廷玉等, 明史 [M] .卷三百一十九,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8265.
- [24] [36] 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73.73.
- ^[25] 马琦, 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6] 大清五朝会典·嘉庆会典 [M],卷十四,北京:线装书局,2006.189.
- ^{[28] [32]}杨锡绂.四知堂文集[M].卷五。"四库未收书辑刊"玖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152.148.
- ^[29] 钦县志(民国) [M].卷三《民族志》.
- Steven B. Miles. *Upriver Journeys: Diaspora and Empire in Southern China*, 1570-185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5-26. 241.
- [3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民族事务类·贵州安笼总兵宋爱等奏在永丰岜赖寨民卢全家 缉获散符控害的黄三、韦阿三、罗阿韦、罗龙,打死王阿利,续获王阿耳、王文甲、王文魁、 阿保、郭师傅审办释放等有关折[Z].全宗 4 卷号 2074 号 1.
- [33] 曹本治, 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南卷(下) [M].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7.328-494.
- [34]潘其旭、覃乃昌,壮族百科辞典[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410.

- [35]鲁西奇,中国历史的南方脉络[C]//鲁西奇,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鲁西奇,层累、汇聚地造成的地域古史系统——以先秦越国的历史叙述为中心[J].历史人类学学刊,2013,(2).
- [37] 严庆、刘赫,赞米亚:术语、意涵及启示——基于政治人类学的视角 [J].西北民族研究, 2019, (03).
- Erik Mueggler. *The Age of Wild Ghosts: Memory, Violence, and Place in Southwe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Jianxiong Ma. *The Lahu Minority in Southwest China: A Response to Ethnic Marginalization on the Fronti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 [39] 张先清、杜树海,移民、传说与族群记忆——民族史视野中的南方族群叙事文化 [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4).
- [40] 朱晴晴,移民、市场与社会——清代以来小江地域文化的演变 [D].广州:中山大学,2011,82-83.
- [41] [42] 佚名,勐泐王族世系(汉文、傣文对照) [M],刀国栋等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江应梁序.3.

【学术访谈】

移动的宋辽边疆 ——英国伯明翰大学史怀梅教授学术访谈¹

董永强2

一、前言

史怀梅(Naomi Standen),1994 年英国杜伦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东亚研究系博士毕业,学位论文题目为《从中原北部到辽的越境举动:约 900-1005》(Frontier Crossing from North China to Liao, c. 900-1005),此后,历任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 Oxford)中国史初级研究员(1993-1997)、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苏必略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Superior)历史系亚洲史副教授(1998-2000)、澳洲新堡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历史学院中国史讲师(2000-2007)、英国新堡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历史学院中国史高级讲师(2007-2011),现为英国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艺术与法律学院(College of Arts and Law)历史 与文化系(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中古史教授(2011-)。目前,她致力于欧亚北部边疆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中古时期东北亚越境者、边界、边疆之间的互动关系。执笔《剑桥中国史五代宋史》(五代)部分,2007年出版专著 Unbounded Loyalty: 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此书 2007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学界有很大反响。相关评介可参见 Richard L. Davis,"Book Review: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47(2007): 527-528; Paul Jakov Smith, "Review: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8.1(2008): 242-250; 张帆、封评: Naomi Standen,

35

9 2 2

¹ 本文刊于《汉学研究通讯》第 38 卷第 4 期;转载自"宋史研究信息"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CUDtJjD20Sg4VhwxCRWGeg(2020-2-27)。

²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访问学者。